

王元化与黑格尔的对话及其文论史意义

杨水远

内容提要 20世纪50年代后,王元化始终与黑格尔处于紧张的对话状态。在第二次反思中,王元化通过对黑格尔理性精神和知性方法的领会,重建个人理论自信,将黑格尔学说运用于学术研究,为新时期《文心雕龙》研究和文学观念建构提供了新思考。就王元化与黑格尔的对话来说,可谓之“入”。在第三次反思中,王元化以对黑格尔同一哲学所蕴含的“绝对理性”“普遍规律”“具体普遍性”等问题的反思为跳板,最终指向“五四”激进主义和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重估《社会契约论》,可谓之“出”。一“入”一“出”,王元化完成了其与黑格尔长达半个世纪的理论对话,这一对话与中国当代文论发展同脉搏、共轨迹,成为当代文论学理演变的重要象征。

关键词 王元化;黑格尔;学术参照;思想跳板

章学诚尝言:“学者不可无宗主。”^[1]所选之宗主,既要在学问上可为后学所法,又要在学术史上有一定之地位,经十数年的沉潜含玩,学者的气质和学问等均受宗主的深刻影响;而后出转精、自出机杼,则需要对前辈学者进行超越与反思。因此,从皈依到走出,从“入乎其内”到“出乎其外”,就成了学术代际发展的基本规律。本文从此思想对话之角度,讨论王元化对黑格尔的“入”与“出”,并揭橥此学案对理解中国当代文论思想发展的重要意义。自1955年王元化细读黑格尔之后,其思想的演变就始终与黑格尔处于复杂的对话关系中。在早期,王元化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接受和深入思考,不仅重建了个人的理论自信,而且通过对黑格尔思维方式和学术方法的学习,获得了一种跨学科的学术视野,在《文心雕龙》研究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世纪90年代后,王元化对黑格尔同一哲学展开深入重读,并将其推进到对“五四”精神的反思和卢梭《社会契约论》的重估。王元化对黑格尔的接受和反思,既是王元化个人思想演变的内在依据,也反映了中国当代文论的学理嬗递。

一 入乎其内:作为精神支柱与学术参照的黑格尔

1955年的胡风事件,让受到牵连的王元化陷入深刻的精神危机之中。据夏中义等学者的研究表明^[2],正是通过阅读黑格尔,王元化才从此危机中解脱出来。对于初次阅读黑格尔的王元化而言,《小逻辑》无疑是“天书”。因此,首先吸引王元化注意的不是黑格尔绵密的体系建构模式和学术方法,而是黑格尔对“理性”认识“绝对理念”能力的热情讴歌。被王元化反复征引的黑格尔《小逻辑》开讲辞中的一段话,便透露出其中消息:“精神的伟大和力量是不可以低估和小视的。那隐蔽着的宇宙本质自身并没有力量足以抗拒求知的勇气。对于勇毅的求知者,它只能揭开它的秘密,将它的财富和奥秘公开给他,让他享受。”^[3]王元化每读到此就“心情激荡”。

然而,真正要从精神困境中解放出来,仅仅对理性万能的激情向往,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关键在于,王元化在黑格尔哲学中读出了“知性”的秘密,并重新界定了认识过程论。当时的权威理论认为,认识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通过

对黑格尔《小逻辑》的深入阅读，王元化发现：在感性和理性之间，还有一个知性阶段，只有用感性、知性、理性的三分法，取代原有的感性、理性二分法，诸多理论困境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对于王元化而言，这一发现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自己精神困境的重要关节。此后，王元化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为认识过程的三分法寻得了更为合法的理论来源，重新解释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让王元化更加笃定了自己的发现，加深了对黑格尔的“服膺”。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深入理解，王元化的思维超出了那一时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读黑格尔成为王元化承受人生苦难的精神支柱。

需要注意的是，黑格尔之所以能为王元化提供精神支柱，不仅仅在于黑格尔那口号式的理性主义话语，也不仅仅在于其发现知性所带来的思想解放；更在于黑格尔本身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方法，对王元化思考当时本土文艺理论问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论指导和学术参照。作为精神支柱的黑格尔，对王元化个人而言，也许非常重要，但如果没有在其文艺思想上造成重大影响，这种作用就不具有历史意义，作为精神支柱的黑格尔也只有成为学术参照的黑格尔，才能实现其价值。

从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可窥得黑格尔对王元化的学术参照意义。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无疑是黑格尔的理性精神坚定了王元化探讨创作规律的决心。创作过程历来被认为是一个理论难题，在当时文艺心理学被认为是唯心主义而一度沉寂的情况下，王元化敢于去触碰创作论，正是基于对黑格尔清明刚毅理性精神的认同。黑格尔对理性的赞美，对康德不可知论的批判，让带有一定理想主义的王元化激赏不已，在这个意义上，王元化认为康德比不上黑格尔^[4]，并在读黑格尔《美学》时，从中总结出“美的根本大法”^[5]。可以说，黑格尔的理性精神，成为王元化试图总结“一劳永逸”创作规律的基本动力，也是王元化撰写《文心雕龙创作论》的重要内因。

更为重要的是，《文心雕龙创作论》的八个议题，均是王元化通过黑格尔哲学，透视中国古典文论的一种理性选择。根据刘勰《文心雕龙》的结

构，谈及“创作论”的是后25篇，王元化为何仅仅选取其中八个“尚有现实意义”的方面加以讨论？其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其最为重要的原因，正在于这些方面或多或少可以与西方文论，尤其是黑格尔美学进行对照发挥，黑格尔美学的问题域，影响了王元化对《文心雕龙创作论》议题的选择。王元化在读书笔记中写道：“他……对于风格、才能、独创性的阐发，对于独创行为的剖析等等，处处显示了渊博的知识和卓越的审美趣味，就是今天看来，如果撇开其中某些可以原谅的失误外，也足以令人为之叹服。”^[6]可见，黑格尔关于创作论方面的论述，一直是王元化的学术敏感点。以此切入《文心雕龙》创作论的研究，势必处处皆着黑格尔的色彩。

就具体内容来看，《文心雕龙创作论》得益于黑格尔之处尤多，其中的几篇重要附录，都是王元化从读黑格尔笔记中直接“抄录出来的”^[7]。为了与“心物交融”说相对照，王元化在该章附录中，专门论述了黑格尔的审美主客体关系学说，认为“刘勰心物交融说初步接触到审美的主客关系问题”^[8]。为了讨论“杂而不越”，王元化在该章附录二中，专门论述了黑格尔美学中关于“整体与部分和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关系”。其他诸问题，也可以找到黑格尔相关论述对王元化的影响。“艺术想象”说与黑格尔的主体性思想、想象理论对照；“才性”说与黑格尔的风格论和天才说对照；将“拟容取心”说解释为意象是表象和概念的综合，暗合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之意；“三准”说对比的主要是黑格尔所阐释的“理念经过了怎样自我发展的过程而形成具体的艺术作品”^[9]；在论述“率志委和”时，则利用黑格尔关于知识直接性和间接性的论述，来阐释创作的直接性与间接性。

其中，又用《文心雕龙》中“情志”一词翻译和解读π ἄθος最为论者所称道。王元化在阅读《美学》时发现，黑格尔也无法完全用德文准确传达希腊词π ἄθος的意蕴。王元化认为，该词的原始含义为“一种本身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用以指称“激起人物行动起来的内在要求”^[10]。朱光潜将之翻译为“情致”，王元化以为该译词无法传达其中的“动情力”和“悲怆性”意蕴，因此主张

用刘勰的“情志”说进行对译。王元化认为，古代希腊人也用 $\pi\acute{\alpha}\theta\omicron\varsigma$ 一词来表述文学创作中的思想感情， $\pi\acute{\alpha}\theta\omicron\varsigma$ 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体，而《文心雕龙》中把作为情感因素的“情”和作为志思因素的“志”连缀成词，用以表示情感和志思的互相渗透^[11]，从而将二者之间的联系加以打通。

在思维方式和学术方法上，王元化也受到黑格尔的深刻影响，《文心雕龙创作论》即是用黑格尔美学方法解决古典文论问题的典范之作；其对知性思维的批判，对辩证思维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综合研究方法的应用，均与黑格尔学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王元化通过对知性思维的批判走向辩证思维。对于知性思维的发现和分析，王元化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重要贡献：其一、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加入知性，完善了认识过程论；其二、从当代文论对知性分析法的运用及其后果的反思，走向真正的辩证思维。就第二方面而言，王元化借助了黑格尔的命题：“知性不能掌握美。”王元化认为，知性“总是把统一体的各差异面分裂开来看成是独立自在的东西”^[12]，而“美”和“艺术作品”必然是一个生气灌注的有机整体，知性“分”的规定，无法把握“美”和“艺术作品”的有机整体性。因此，“采取孤立的、抽象的考察事物的知性分析方法……如果不是把它作为达到具体的过渡环节，固执为最终的范畴，那就不可能把握美”^[13]。王元化“破”知性，实际上是为了“立”辩证理性。在王元化看来，知性区分思维与形而上学对应，而理性综合思维则是辩证法的题中之意，在文论思维中，有必要将理性思维“合”的优势补充“知性”思维的“分”，以把握美的艺术的整体意蕴，“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是知性所不能理解的”^[14]。王元化认为辩证思维与作为有机体的文学作品和“美”具有同构性，只有从知性走向理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才能真正把握文学作品的美学意蕴。

其次，王元化对辩证思维的提倡和对知性分析思维的批判，最终走向综合研究法。早在1981年《关于鲁迅研究的若干设想》中，王元化就对鲁迅研究中“孤立地研究鲁迅和他的作品”^[15]的空疏，提出了批评，认为应该利用经济、政治、历史、文

学创作论、思想史和美学的方法进行综合研究。在1984年版《文心雕龙创作论》中，王元化更自觉地使用了综合研究法，并将这种方法表述为：“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16]《文心雕龙创作论》一直被视为一部比较文学著作，即在于作者通过西方近代文论对相关问题的思考，综合研究《文心雕龙》。所涉及到的西方文论家和作家不少，其中黑格尔的出场次数无疑是最多的，也是整体性的，王元化“在刘勰和黑格尔之间充当跨时空交流的媒介”^[17]。王元化通过《文心雕龙》与黑格尔美学的对照研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中西会通、古今会通、学思并重的学术格局”^[18]，为后来的比较文学研究树立了榜样。

在此基础上，王元化形成了一种自觉的中西学术参照意识，对以胡适为代表的“用进化论角度去研究先秦诸子，用实验主义去评估中国古代哲学”^[19]的以西衡中的比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这种比附阻碍了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王元化撰《文心雕龙创作论》时，虽然“以西学为主体的影响仍然存在”^[20]，但他有意识地将中西对相关问题的论述在形式上予以区别，以体现其基本的学术态度和理论追求，即中西学术比较研究的基本关系是参照而不是比附。在20世纪90年代更为成熟的著作里，王元化写道：“研究中国文化不能以西学为坐标，但必须以西学为参照系。”^[21]

王元化对黑格尔的“阅读”和“进入”，经历了对黑格尔精神的服膺、文本细读到对黑格尔思维方式和方法论运用两个阶段。王元化熟练运用黑格尔思想的同时，也逐渐对黑格尔的思维缺陷有了更深刻的把握，为此后的反思奠定了基础。

二 出乎其外：作为反思对象和思想跳板的黑格尔

王元化20世纪90年代的第三次反思以重读黑格尔同一哲学为起点，具体落实到对理性万能论、绝对规律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具体的普遍性和国家哲学等问题的反思。如果说以上还只是王元化对黑格尔哲学具体问题的重读，那么，反思“五四”和重估《社会契约论》，则是王元化在反

思黑格尔哲学基础上的纵身一跃。这一跃，以反思黑格尔为跳板，抓住中国现代以来思想发展的重要关节，最终进入对整个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反思。因其反思的理论深度和深远影响，王元化逐渐从黑格尔的影响中超越出来，并开掘出新的思想境界。

王元化对黑格尔同一哲学的瞩目，首先来自其对黑格尔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王元化常援引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的论说：“在东方宗教中主要的情形就是，只有那唯一自在的本体才是真实的，个体若与自在自为者对立，则本身既不能有任何价值，也无法获得任何价值。只有与这个本体合而为一，它才有真正的价值。但与本体合而为一时，个体就停止其为主体，而消逝于无意识之中了。”^[22]王元化根据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评价，将“尚同贵公”思想，看作是同一性思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体现。1985年，王元化写道：“东方哲学大抵强调同一性。”^[23]1986年12月20日在题为《简论尚同思想的一个侧面》的发言中，王元化也指出：“西方学者认为东方哲学强调同一性而忽视特殊性这一观点是值得重视的。”^[24]这里所引述的西方学者正是黑格尔。

王元化进一步揭橥了“尚同”思想与黑格尔同一哲学的内在相通。王元化认为：“先秦诸子学说各异……但大抵都倾向于强调同一性的本体论。”^[25]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法家的君主本位主义、墨子的尚同思想、儒家的克己复礼、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等，均侧重以社会道德排斥自我，形成一套固定的思维模式和伦理道德规范，都是尚同思想的表现。黑格尔哲学能在20世纪的中国产生巨大影响，其内在学理亦在此。更进一步，黑格尔哲学与中国古典哲学合流，形成了中国当代文论中的同一性思维传统，成为当代文论一元化困境的重要思想基础，给中国文论带来了巨大的负面效应^[26]。王元化认为，“尚同贵公”作为一种生活理念，具有理想性和一定的合理性，但“强调同一性的本体论却往往陷于一偏”，其结果是“用共性去淹没个性，用同一性取消特殊性”^[27]。

在20世纪90年代的重要文章里，王元化不止一次谈及对黑格尔同一哲学的反思。1993年7月1日，王元化在日记中写道：“朱学勤曾向我谈及，

认为我说的不能用逻辑推衍历史，他很赞同。今天我再向朱学勤谈到这一看法，批判过去自己也十分相信的逻辑与历史一致的观点。此说之根源乃来自黑格尔的同一哲学。”^[28]2004年，在回顾三次反思历程时，王元化写道：“我从黑格尔那里发现了这种同一哲学，再从他的前辈卢梭那里认识到这种同一哲学运用在国家学说中的危险性，这是我在第三次反思中一个重要的收获。”^[29]学界已注意到王元化反思黑格尔与思想史反思的内在关系，胡伟希即“从反思黑格尔的同一哲学到反对激进主义之间，看到了王先生的一条思想走向”^[30]，激进主义的深层学理，正是“由对‘理性’的崇拜所导致的意志主义”^[31]。这些材料显示，王元化揭示了卢梭的国家哲学、“五四”激进主义以及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等与黑格尔同一哲学的内在勾连。可以说，王元化对“五四”等的深入反思，都以对黑格尔同一哲学的反思为跳板。

在认识论上，同一哲学表现为理性主义，在黑格尔哲学中，主要体现为“绝对理念”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黑格尔通过对康德“不可知论”的批判，建立辩证逻辑来实现这种同一。受黑格尔影响，批评康德和休谟的不可知论，成为中国当代文论最重要的认识论基础，这也是《小逻辑》开讲辞深深触动王元化的原因。反思理性主义是王元化反思同一哲学的焦点，并在反思文艺思想时，首先指向“文艺规律”论，主要体现在1992年版的《文心雕龙讲疏》对1979年、1984年版《文心雕龙创作论》的修订上^[32]。

理性与启蒙是现代思想的一体两面，而绝对理性和启蒙心态，又是一对孪生兄弟。王元化从反思理性主义，最终深化到对意识形态化启蒙心态的反思。王元化认为：“启蒙心态是指对于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的过分信赖。人的觉醒，人的尊严，人的力量，使人类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但是一旦人把自己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视为万能，以为可以无坚不摧，不会受到任何局限，而将它绝对化起来，那就会产生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33]简言之，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即是一种在理性绝对化和真理独断论预设下的唯我独尊心态。王元化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自以为把握和代表了绝对

真理，从而对他者和异见实施强制。王元化晚年走出黑格尔式的独断，走向康德和经验主义启蒙思想家休谟与洛克，无疑包含着王元化对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继承。

王元化对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原则的清理，则是反思同一哲学在方法论层面的重要收获。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思想来源于黑格尔，黑格尔认为：“历史上的那些哲学系统的次序，与理念里的那些概念规定的逻辑推演的次序是相同的。”^[34]恩格斯对这一原则做了明确的概括：“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35]也正因为如此，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一度成为我国当代人文社科研究的基本原则。1982年王元化认为这一原则“不仅可以解决认识论问题，也可以解决美学问题”^[36]。

90年代，王元化对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展开了深入反思。1993年在参加斯德哥尔摩会议时，王元化发言的主要内容即反思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虚妄，认为解决办法是：“拿出证据来而不能只根据逻辑推理。”^[37]在1994年的《自述》中，王元化写道：“在历史的进程中虽然也可以发现某种规律性，但历史与逻辑毕竟不是同一的。逻辑推理不能替代对历史的实际考察，史家的史识必须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实证上。”^[38]对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提出了明确的质疑。1996年《读黑格尔的思想历程》则进一步指出：“从历史的发展中固然可以推考出某些逻辑性规律，但这些规律只是近似的，不完全的。历史和逻辑并不是同一的，后者并不能代替前者。黑格尔哲学往往使人过分相信逻辑推理，这就会产生以逻辑推理代替历史的实证研究。”^[39]

王元化的这一反思在哲学和文学领域引起重要反响，不同的是，哲学界要求回到逻辑本身，文学界则要求回到历史现实。俞吾金认为：“必须放弃寻求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无谓游戏，必须终止逻辑向历史的还原，而把探讨的基点真正地移到逻辑上来。”^[40]文学学者则认为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是“文学史研究的伪命题”^[41]，侧重强调文学现实和文学研究的多样性与活泼性，杜绝概念演绎。

可见，对这一原则的放弃，已经成为学界的某种共识。王元化的反思，无疑是这一共识形成的基础。王元化的弟子蒋述卓也谈及对这一原则的认识：“……在清理‘文气论’的发展线索时，也企图用这种‘正一反一合’的方法去体现所谓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最终我发现我得出的结论是很经不起推敲的。”^[42]

更进一步，通过对黑格尔同一哲学的反思，王元化发现了黑格尔“具体的普遍性”的虚妄，从而走向对卢梭《社会契约论》“公意”说的重估，并将二者相互参证，推进了对中国当代思想史的反思，这也是晚年王元化成为思想家最厚重的一段思想旅程。王元化曾对黑格尔“抽象的普遍性”和“具体的普遍性”之划分十分钦服，认为前者对应知性，强调区分，后者对应理性，强调综合，逻辑井然。70年代，王元化从黑格尔美学中拈出“知性不能把握美”，正式启动对知性思维的学理反思，但并未涉及理性思维；90年代，王元化进一步发现“具体的普遍性”要求将特殊性和个体性包括在自身之内，实际上是用普遍性去消融个体性和特殊性，只有逻辑上的可能，没有事实上的依据；从而将70年代对知性思维的反思，推进到对理性思维的反思。

王元化通过参加朱学勤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发现“具体的普遍性”思想的现实实践，已经在人类思想史上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而其更深层的思想种子，或早在王元化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对卢梭和黑格尔的研究和批判中，即已埋下。王元化同时发现了中国当代某些思潮与卢梭思想之间的内在承续关系，认为“全民”概念与卢梭的“公意”一样，“是一个名为涵盖个别实则排除了所有个别的黑格尔式的抽象”^[43]。王元化认为：“卢梭在设想公意超越了私意和众意，从而可以通过它来体现全体公众的权利和利益。”^[44]这与黑格尔“具体的普遍性”包含个体性和特殊性在自身之内分享了同样的思维方式，也只是黑格尔式的“逻辑迷雾”。1992年5月在给海外学者张灏的信中，王元化曾写道：“要求普遍性能将特殊性与个体性涵盖于自身之内，恐怕只是黑格尔同一哲学的幻想。”^[45]从1992年写作《与友人谈公意书》，一直到1998年《与友

人谈社约论书》，王元化在不断深化对黑格尔的反思和卢梭《社会契约论》的重估。这一反思的意义，已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46]。

由于王元化既是当代思想发展的参与者、见证者，也是观察者和反思者，其自我反思就以其本己性关涉到整个当代思想的发展。也正因为如此，王元化反思黑格尔的意义，就不仅需要放在其个人思想演变中进行考察，也要放到整个当代文论发展史中去加以理解。

三 黑格尔的接受与反思：中国当代文论学理演变的一种表征

西方有学者认为，20世纪的每一种重要的哲学运动，都从攻击黑格尔的观点开始^[47]，以“叛离黑格尔”^[48]为开端。在西方思想史上，黑格尔的影响，呈现出一种周期性复现现象，攻击者有之，研究者有之，皈依者亦有之。在当代中国，对黑格尔的接受，也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呈现出接受、反思和回归的不同阶段。虽然，黑格尔的中国影响与西方不可能同步，“但遇到的热与冷的曲折过程，基本是相同的”^[49]。针对黑格尔与中国当代思想史的复杂关系，许纪霖有一个判断：“一部当代中国思想史，可以说是从崇拜黑格尔到告别黑格尔的历史。”^[50]用更学术性的话语，当代思想史乃是从“黑格尔化”走向“去黑格尔化”的过程。这一判断大体上代表了中国当代思想发展史的一个侧面，也是中国当代文论学理演变的一种表征。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学界普遍站在前苏联机械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扬弃”黑格尔，由于研究水平的局限，造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黑格尔化”，正如雅克·敦德在评价法国学界的黑格尔研究时所指出的：“自以为通过马克思解释了黑格尔，其实是用黑格尔解释了马克思，有时在最基本的地方把马克思还原为黑格尔。”^[51]这一评价同样适合50—70年代部分中国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正因为如此，黑格尔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话语对中国人文学界的影响，既深且广。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人文学者，大多受到黑格尔哲学的熏陶，王元化即坦承：“如果说我也有一些较严格的

哲学锻炼，那就是几次认真阅读黑格尔《小逻辑》为我打下了基础。”^[52]这一训练使得王元化在具体文论写作中，时时“流露和表现出思维敏锐、辨析精审、表达严密等种种优点”^[53]。在回忆1950—1954年间阅读黑格尔的李泽厚曾说：“黑格尔那无情而有力的宏观抽象思维，则好像提供学人一种判断是非衡量事物的尖锐武器；读黑格尔之后，便很难再满足于任何表面的、描绘的、实证的论议和分析了。”^[54]黑格尔的《美学》则通过朱光潜的翻译，深刻影响了中国文论的学科建设，“现代中国文艺学的若干重大理论主题，皆根植于朱译本的自由想象与批判性重建”^[55]。朱光潜本人的美学建构，从“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到晚年的“实践”转向，均受到黑格尔的有益影响^[56]；其中，前者受惠于黑格尔的辩证哲学，后者则获益于黑格尔的历史精神。与王元化散点突破问学方式不同的是，朱光潜的美学思想具有浓厚的学院风格，其对黑格尔的解读更为周详，思想来源也更为驳杂，其早中期美学思想的黑格尔渊源，需要从克罗齐等人的哲学上追溯方可觅得。

具体来看，中国当代文论与美学建构的基本骨架：历史哲学视野、辩证思维、同一性思维、二分法、本质论等，多源自黑格尔哲学。就文艺学的体系建构而言，文学的定义、学科基点的辩证考察、理论框架、论证方式、研究方法、书写风格等均受到黑格尔学说建构模式和表达方式的影响。在论述当代文论的体系建构时，王元化提出，黑格尔的美学体系和刘勰的《文心雕龙》体系仍是当代文论建构最重要的借鉴，认为黑格尔所强调的“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有价值的著作应该是一个有机整体”，“逻辑的完整性和首尾一贯性”，“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等等，对于编写文论教材，可资借鉴^[57]。就文学定义而言，当时的文论教材普遍沿袭黑格尔“美”的定义：“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58]这一定义经别林斯基的阐释，在中国文论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文学被普遍认为是社会生活本质的形象反映。黑格尔对“开端”的辩证分析和哲学体系的逻辑演绎，对中国文论建构亦影响甚巨，如有学者从“艺术一般”出发，通过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去建构和演绎文艺美学体系，即是对黑格尔体系建构方式

的借用^[59]。其细微处，则体现在文论研究方法和写作风格上，当代文论家和文论著作几乎没有不受黑格尔辩证思维和辩证方法影响的，辩证表述成为文论家进行文论书写的普遍风格而沿袭至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为一种特定的表达方式：辩证综合论述句式^[60]。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西方现代哲学思潮的引进和人们对黑格尔哲学更为深入的了解，黑格尔学说的负面效应逐渐为学界所认识。人们普遍认为，黑格尔及黑格尔主义为当代思想的先验性立场、理想主义、泛逻辑主义等弊病负有责任。学界一度流行“回避”（李泽厚）、“走出”（封孝伦）、“告别”（单世联）、“更不要”（许苏民）黑格尔^[61]；黑格尔的影响，被中国当代思想界当成“一个沉重的精神负担”^[62]。俞吾金甚至认为：“当代中国理论界如果真想解放自己的思想，那么最需要的恐怕就是像《反黑格尔》这样的著作了。”^[63]90年代中期，在后现代差异哲学和以王元化为代表的本土思想家自我反思的双重影响下，中国文论界对黑格尔的学理反思更加深入具体，二元对立思维、理性主义、宏大叙事、同一性思维、乌托邦主义、本质主义等受到普遍质疑和批判，促进了中国文论学理建构的转型和发展。建构主义、关系主义、修辞论等文论体系的提出，正是这一转型的重要收获。

王元化与黑格尔的“对话”关系，基本上可以纳入以上思想史脉络中加以考察。特殊之处在于：王元化对黑格尔的接受和反思，以其长时段性和深刻性，几乎贯穿了中国当代文论发展的前六十年，反映了黑格尔在当代中国影响力的变化。如果说黑格尔是西方学术影响中国当代文论学理建构和演变的重要代表，那么，王元化则正是接受这种影响的中国文论家的重要代表。就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来说，阅读和接受黑格尔是一个时代的命题，80年代后，反思和重读黑格尔也是一个时代的命题。但是像王元化那样，将接受和反思黑格尔综合于一身、一人而贯穿两个时段，为当代文论的发展划出了一道曲折轨迹者，却极其少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元化与黑格尔在接受和反思之间所形成的“对话”关系，就成为当代文论学理演变的重要象征。

值得注意的是，王元化对黑格尔的吸收和利用，以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内容为多，而本体论方面较少^[64]；对黑格尔的早期哲学，也几乎没有涉及，其所理解的黑格尔与原本的黑格尔之间，依然还存在着较大距离。王元化对黑格尔的反思，主要集中在黑格尔主义的思维方式、学术方法和国家观念上，对知性和理性的功能区分还存在着较大的含混，而对黑格尔影响史的全面梳理和理论反思，显然也不可能在“一个过渡时代的人物”^[65]王元化手上得到彻底完成。这只有在重审黑格尔的基础上才可能完成的。虽然，在90年代对黑格尔思想及其中国影响进行了多层面的清理，但王元化依然保留对黑格尔的敬仰，“精神的力量是不可低估和小视的”，黑格尔的豪言壮语依然是王元化的座右铭，他也并未减少对“黑格尔总念三环节理论的服膺”^[66]。黑格尔高超的艺术欣赏水平和对创作主体性的精深研究，更是得到了晚年王元化的欣赏和赞美。这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态度，何其相似乃尔。当知识界普遍将黑格尔目为“死狗”时，马克思公开承认“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可以说，黑格尔是王元化的精神源点，也是王元化的精神起点，最后，依然是王元化精神的归宿点。

“后黑格尔时代”的人文学术，“正一反一合”的逻辑演绎似乎已经不再适合，但王元化接受和反思黑格尔的过程，以及本文正在从事的梳理总结工作，却无疑期待着一种“螺旋上升”的学术效应。在反思黑格尔之后，“原本的黑格尔”已经成为学界重要的研究方向，正如单世联指出的：“只有在彻底批判、清理了作为总体集权的意识形态的黑格尔主义之后，对黑格尔的理解才能真正是哲学的；同样，只有在认真研究了黑格尔哲学后，才能真正弄清楚黑格尔的意识形态化过程，并对之做出彻底批判。”^[67]只有在黑格尔哲学本身和黑格尔思想效应之间做出准确的分疏，才能使问题得到根本的澄清；简单的强调“崇拜”“告别”和“黑格尔化”“去黑格尔化”的历史单线递进，会遮蔽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近年来，邓晓芒、张汝伦、吴晓明等提倡“回到原本的黑格尔”^[68]，对黑格尔的接受又回到了一个更高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中国文论的学理建构有望回归一种理性：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视野

与辩证法思维方式，依然会在中国未来的文论建构中，发挥更为重要的学理建构作用，而黑格尔的负面效应也将得到更好的规避。在这个意义上，重读黑格尔，充分释放黑格尔哲学体系所具有的历史感、作为方法论的辩证法，承认概念的主体间性所蕴含的理论生长空间，对于建设中国特色文论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告而不别黑格尔”^[69]，将成为未来文论体系建构的重要学理基础。

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话语体系建构，必然建立在对当代文论发展的总结和“自否定”的基础上。对此，王元化曾发表过重要意见：“就思想体系来说，我认为后一代对前一代的关系是一种否定的关系。但否定就是扬弃，而并不意味着后一代将前一代的思想成果彻底消灭，从而把全部思想史作为一系列错误的陈列。前一代思想体系中积极的合理因素，被消融在后一代思想体系中，成为新的质料生成在后一代思想体系中。这是辩证法的常识，也是思想史的事实。”^[70]如今，黑格尔影响下的中国文论，经过以王元化为代表的思想家接受和反思的双重对话，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总结这些经验，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特色文论的发展。

结 语

学者之于宗主，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继承；出乎其外，故能超越。王元化对于黑格尔，其“入”则有“韦编三绝”而成的《读黑格尔》《文心雕龙创作论》和具有文学观念建构意义的《文学沉思录》等重要著作；其“出”则有20世纪90年代的反思“双壁”：《九十年代反思录》和《九十年代日记》。这一“入”一“出”间，正是王元化思想走向成熟，成就思想家的过程，也是黑格尔在中国文论影响之变化曲折发展的重要个案。在一定程度上，这成了中国当代文论学理演变的重要象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历史经验研究”(项目编号18ZDA278)的阶段研究成果]

2015年版。

[2] 夏中义曾对王元化此时心理状态做过详细研究，并获得晚年王元化的认可。此处从其说。参见夏中义《王元化襟怀解读》，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

[3]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第35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4][7][20][21][33][37][38][43] 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录》，第143页，第26页，第40页，第20页，第143页，第31页，第303页，第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5][15][36][57] 王元化：《文学沉思录》，第153页，第56页，第5页，第3—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6][10][11][12][13][39][44][52][66] 王元化：《读黑格尔》，“读黑格尔的思想历程”(后简称“代序”)第11页，第11页，第18页，第29页，第29页，“代序”第10页，“代序”第7页，“代序”第2—3页，“代序”第8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8][9][14] 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第85页，第196页，第2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16] 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第3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17][53][64] 王丽丽：《王元化评传》，第152页，第190页，第52页，黄山书社2016年版。

[18] 谢志浩：《有学问的思想家》，见《一切诚念终将相遇——解读王元化》，钱钢编，第56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9] 王元化：《清园论学集》，第6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22][34]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第127页，第36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23][24][25][27][70] 王元化：《传统与反传统》，第59页，第1页，第2页，第2页，第1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26] 参看拙文《同一性思维与中国20世纪50—70年代文论的一元化》，《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28] 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第136—1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9] 参见王元化《记我的三次反思历程》，《王元化文论选》，第396—39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1] 章学诚：《文史通义》，第1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 [30] 钱钢:《写在前面》,见《一切诚念终将相遇——解读王元化》,第8页。
- [31] 胡伟希:《在思想与德性互化的每一瞬间》,见《一切诚念终将相遇——解读王元化》,第16页。
- [32] 夏中义、何懿:《论王元化“文心雕龙研究”版本修订——从“心史裂痕”到“潜反思”》,《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 [33]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03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 [40] 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第349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 [41] 田义勇:《历史与逻辑统一:文学史研究的伪命题》,《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 [42] 蒋述卓:《从学术史学角度看王元化的意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 [45] 王元化:《清园书简》,第476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 [46] 参见夏中义《卢梭在当代中国的回响:从思想史看王元化重估〈社会契约论〉》(上、中、下),载《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1期、第2期、第3期;陆晓光《从“理想主义”到“人文理想”:纪念王元化九十诞辰》,《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5期。
- [47] M. 怀特:《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杜任之主译,第7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 [48] 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李步楼等译,第2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 [49] 李衍柱:《重读黑格尔:谈黑格尔〈美学〉与中国文艺学建设》,《文学评论》1999年第3期。
- [50] 许纪霖:《另一种启蒙》,第207页,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
- [51] 雅克·敦德:《黑格尔和黑格尔主义》,栾栋译,第60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 [54] 李泽厚:《杂著集》,第367页,三联书店2008年版。
- [55] 李咏吟:《朱译黑格尔美学与现代中国文艺学建设》,《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5期。
- [56] 宛小平:《黑格尔与朱光潜美学》,《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6期。
- [58] 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第142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 [59] 周来祥:《文艺美学》,第2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 [60] 杨国荣、刘梁剑、吴闻仪:《后形上学时代的形上之思:杨国荣教授“具体的形上学”访谈》,《哲学分析》2012年第3期。
- [61] 李泽厚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宁要康德,不要黑格尔”。另参见封孝伦《走出黑格尔——关于中国当代美学概念的反思》,《学术月刊》1993年第11期;单世联《告别黑格尔:从张中晓、李泽厚、王元化到顾准》,《黄河》1998年第4期。许苏民提出“不要康德,更不要黑格尔”,参看胡静《关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和哲学创新的相关问题:许苏民教授访谈录》,《江汉论坛》2017年9期。
- [62] 冒从虎、郜庭台:《黑格尔哲学:一个沉重的精神负担》,《学术月刊》1989年第5期。
- [63] 俞吾金:《实践与自由》,第145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 [65] 王元化语,转引自高瑞泉《一个真诚的思想者》,见陆晓光主编《清园先生王元化》,第19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 [67] 单世联:《告别黑格尔:从张中晓、李泽厚、王元化到顾准》,《黄河》1998年第4期。
- [68] 参见邓晓芒重译《精神现象学》,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张汝伦等《黑格尔与我们同在:黑格尔哲学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吴晓明《黑格尔的哲学遗产》,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
- [69] 王坤:《告而不别黑格尔:中国当代文论学理建构轨迹的反思》,《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 [作者单位: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吴子林